

新制度经济学

朱琴芬*编著

X
i
n
z
h
i
d
u
j
i
n
g
j
i
x
u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制度经济学

朱琴芬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朱琴芬编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

ISBN 7-5617-4606-7

I. 新... II. 朱... III. 新制度经济学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494 号

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新制度经济学

编 著 朱琴芳
项目编辑 孔繁荣
文字编辑 王兆根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苏州市永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4606-7/F · 124
定 价 1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这本《新制度经济学》是为非经济学专业的新制度经济学学习者和爱好者编写的。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正式问世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新兴学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引起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普遍重视,这种现象大概只能用这个学科新颖的理论价值和比较大的实用价值来解释。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历程,西方经济学登陆中国大陆大抵与此同步。以新古典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学说,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新古典的增长模式使我们看到了资本要素的巨大作用。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对于当时还片面强调劳动价值论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而言,突出“资本”这个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意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有关方面的详细分析见本书的导言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当然属于西方经济学,但是,它同我们过去理解的西方经济学又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范畴。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换句话说,就是把“制度”看成是最重要的要素。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制度是可以分析的,因为制度本身具有效率,而且可以计量。因此,制度就要耗费成本。制度的效率应该用自身的成本和功能共同计量。

不过,同我们习惯理解的“制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制度”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制度”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制度,还包括习俗、意识形态等观念层面的东西。新制度经济学把它们定义为“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同我国学术界前些年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既不玄,也不空,它关于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得见,摸得着”。现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已经走进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殿堂,产权、交易成本、委托—代理等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畴。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接受“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最重要变量”这个观念是困难的。但是,实践是最好的课堂——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对外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不同发展模式和愈来愈引起人们重视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使决策层和理论界一致认识到了制度建设的作用。近年来,“产权”、“交易成本”、“制度成本”、“路径依赖”、“非正式制度”等一大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在各种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文章中出现,有些已经进入政府的文件中。

然而,如果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只是这些概念的堆积,那就错了。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分析经济问题的视角、一种思想方法。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它们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经济史。在笔者看来,这四个部分,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实际工作者和关心改革发展的青年学生来说,都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本书的编写注意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历程和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舍弃了一些定量分析方法,力求简明、通俗。

朱琴芬

2005年9月于华东师大

目 录

1	前 言
1	第一章 导 言
1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7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24	第三节 学习、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31	第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31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45	第二节 制度的构成
64	第三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64	第一节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76	第二节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88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105	第四章 交易成本理论
105	第一节 交易成本的理论范畴
116	第二节 交易成本与经济效率
131	第五章 产权经济理论
131	第一节 产权的一般原理
148	第二节 产权分析的意义

169	第三节 产权的基本作用
182	第六章 企业制度
182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起源和主要形式
190	第二节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211	第七章 新经济史
211	第一节 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局限
220	第二节 第一次经济革命发生的原因
224	第三节 对工业革命产生原因的再认识
234	第四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240	第八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240	第一节 国家起源和诺斯的“国家模型”
252	第二节 “诺斯悖论”
258	第三节 国家理论的应用
265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导 言

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就不难理解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也不难理解借鉴反映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运作实践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国内愈来愈多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本章着重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上,把制度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谓源远流长。亚当·斯密、J·S·穆勒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德国、英国和美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冯·维塞尔和哈耶克,熊彼特、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制度分析方法,这说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都已经看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过,由于缺乏独立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制度分析一直没有发展成一个有着特殊理论意义的、独立的经济学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直接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于 1937 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为标志。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一个学科并真正流行起来、引起人们关注,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一般来说,研究“经济为什么会增长”是每一个经济学流派都感兴趣的课题。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的经济理论。

魁奈研究的是农业社会,他认为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农业年预付的变化,因为只有农业才生产纯产品。而农业年预付又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支出倾向、政府的赋税政策和农业投资收益。他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进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社会消费支出倾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消费支出倾向是指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与社会对工业品的消费支出之间的比率。如果农产品消费倾向降低,农业生产就会出现亏损,从而引起国民经济持续衰退。反之,工农业生产就会持续增长。可见,经济增长随农产品消费倾向的变化而变化。

其次,赋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魁奈论证了不同的赋税对租地农场主的收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他特别强调,损害农业资本的赋税政策是18世纪法国农业衰退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第三,农业投资收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增加农业投资收益,既可以依靠应用新技术,也可以增加投资。魁奈主要研究了增加投资对提高农业投资收益的影响。他认为,增加投资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改变农产品的贸易条件。那么,农业投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呢?假设存在着某种原因,如有利的贸易政策或新开辟了农产品市场,农业投资收益率就会增加。新增的农业投资收益一半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半会回到租地农场主手中,结果农业年预付会增加,下年农业产出会提高,农业预付又会进一步增加。这样,农业投资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率,而地租、政府岁入、工业生产会以此比例逐年增长。只要土地所有者愿以农业收益增长额的半数留给租地农场主,这个过程就会

持续下去。^①

20 世纪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经典。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以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生产函数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某一组合同可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依存关系。

假定用 Q 代表产量;用 $x_1, x_2, x_3, \dots, x_n$ 代表 n 种生产要素各自的投入量,那么,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Q = f(x_1, x_2, x_3, \dots, x_n)$$

生产函数是以技术水平已知为前提。在技术水平已知的前提下,如果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为一定,那么所对应的产量也就一定。

如果只考虑两种生产要素,例如劳动(用 L 表示)和资本(用 K 表示),那么生产函数就为

$$Q = f(L, K)$$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柯布和道格拉斯研究了 1899—1922 年美国的统计资料,企图找到资本、劳动和产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建立了这一期间的生产函数。西方经济学家称其为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公式是

$$Q = AL^a K^{1-a}$$

式中, Q 代表产量; L 代表劳动投入量; K 代表资本投入量; A 为正常数; a 是一个小于 1 的正数。

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产量、劳动和资本都是总量概念。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根据美国的历史资料中的统计数据得出来的,因此其产量是全国总产量、劳动量和资本量,也是总投入量。 Q 是国民生产总量,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来替代它。所以,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也可表述为

^① 胡乃武等:《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 17—24 页。

$$Y = AL^a K^{1-a}$$

两边取对数,得

$$\ln Y = \ln A + a \ln L + (1-a) \ln K$$

两边再对时间求导,并注意到 A 为常数,则

$$\frac{dY/dt}{Y} = a \frac{dL/dt}{L} + (1-a) \frac{dK/dt}{K}$$

两边同时乘以“ dt ”,则有

$$dY/Y = a dL/L + (1-a) dK/K$$

将 dY 、 dL 、 dK 分别用 ΔY 、 ΔL 、 ΔK 表示,则上式变为

$$\Delta Y/Y = a \Delta L/L + (1-a) \Delta K/K$$

上两式中, dY/Y 或 $\Delta Y/Y$ 就是收入增长率(经济增长率), dL/L 或 $\Delta L/L$ 就是劳动力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dK/K 或 $\Delta K/K$ 就是资本增长率。

如果用 G_y 表示收入增长率,用 G_l 表示劳动力增长率,用 G_k 表示资本增长率,则有

$$G_y = a G_l + (1-a) G_k$$

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在这个基本公式中,收入增长是由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两种因素引起的。 a 表示在收入增量中有多少是由劳动力增长带来的, $(1-a)$ 表示在收入增量中有多少是由资本增长带来的。^①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被归结为两个要素的投入:一是资本,二是劳动力。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加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或者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从而提高这两个要素的效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都是用这个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的。

① 胡乃武等:《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 94—97 页。

当经济学家用这种视角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产生了当时主导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著名命题:“贫困的恶性循环”。

“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意思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取决于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居民没有储蓄能力,不能形成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资本。简言之: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发展迟缓,而经济发展迟缓又引起储蓄不足。

“贫困的恶性循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民族自决权,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这个模型,要发展经济,就应该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援。

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影响下,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借债,清偿困难。1960 年发展中国家借入的长期债务为 200 亿美元,1970 年是 635 亿美元,1980 年达到 4233 亿美元,到 1982 年总债务为 8300 亿美元,1990 年初达到 13410 亿美元,债务发展十分迅速。^①

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外资的大量注入,曾一度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就。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相继出现了债务清偿困难,陷入债务危机之中。

1982 年,当时的墨西哥财长通知美国财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告知墨西哥无力支付到期的 195 亿美元的本息,引发了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震荡。

第二,发达国家政府、世界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提供资本帮助,但效果不同。试以斯里兰卡和韩国为例。斯里兰卡和韩国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取得独立。斯里兰卡从锡兰继承了稳定的管理结构,建立了通讯和运输系统,有发展良好的教育制度。1950 年,韩国

① 杜厚文等:《世界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第 196—197 页。

的人均 GDP 不到斯里兰卡人均 GDP 的 82%，1963 年是 97%，1973 年则为其 186%。到了 1983 年，韩国的人均 GDP 已超过斯里兰卡 600% 以上。这种难以置信的差距拉大的原因是什么？外国援助或许是一个可以解释的因素，然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韩国的外援急剧减少时，斯里兰卡的外援数量却不断地增加。这样看来，外援没有给受援国带来有利的影响，反而对接受国产生有害的影响。^①

从上述分析可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不是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而是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以及如何正确使用资本的问题。

虽然，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来说，资本投入十分重要，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如果依赖的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资本就容易获得；反之，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不仅不能形成资本，而且已经得到的资本也不会用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被白白地浪费掉。

正如彼德·鲍尔 1957 年同他的合作者发表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学》所论证的“与其说发展依赖资本积累，不如说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② 他们在书中批评了传统发展理论“对资本积累过分关注而忽视现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鲍尔后来为他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洁而坚实的论据：“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始于不发达。假若恶性循环理念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类将仍处于石器时代。”^③ 在鲍尔看来，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初始的贫穷状态之后，决定其经济发展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于本国的制度和政府行为。^④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鲍尔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流浪汉”，他的不同观点没有人响应。^⑤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南美、非洲和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证实了彼德·鲍尔富有远见的洞察力。

① (美)詹姆斯·A·道：《发展经济学革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第 125 页。

② 同上，第 9 页。

③ 同上，第 32 页。

④ 同上，第 5 页。

⑤ 同上，第 2 页。

彼德·鲍尔的研究反映了发展经济学重点的转移。

事实上,不难看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列举的那些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自变量,储蓄、投资和劳动力,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具有多大的效率,都要依赖于社会政治环境所提供的制度框架。因为经济增长是一个要素的配置过程,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那些经济要素才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这些经济要素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决定了这些要素的效率。

二、均衡分析在解释发展中国家 经济现实问题时的局限性

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价格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均衡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问世之前,均衡分析是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的分析方法。

所谓均衡分析,是指以价格均衡为基础来分析供求变化,解释资源流动及其社会经济现象。均衡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一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会自动达到均衡点,均衡点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就会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于是价格又下跌,回到均衡价格;反之,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供给就会减少,市场价格再次回到均衡价格。均衡价格是总供给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水平,它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于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供求双方讨价还价形成的。按照均衡分析思想,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价格下降,资源就会从供给方流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价格就会上涨,资源会流入供给方。

显然,均衡分析是以最大化和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制度条件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所要求的分析条件是:第一,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第二,资源流动只服从价格信号,没有其他障碍。但是,如果市场机制发育还不成熟,政府对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进行行政性干预,那么,资源流动就不会服从价格信号,这时决策者面对的那

个价格信号本身就是一个已经失真、并没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如此,均衡分析就失去了适用的前提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国内的市场发育都不健全,不具备均衡分析的制度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均衡分析就无法正确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因为,价格现象所反映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在这个表层下面,隐含着的是一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即定价机制。而决定这个定价机制的,则是一个社会经济的组织制度与财产结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初步取得成功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步向城市转移。关于城市工业企业的改革从哪里切入?在理论界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改企业,即改革企业制度,包括探索股份制、实行承包经营等等。二是改价格,即放开价格管制,下放定价权。主张改价格的学者专家认为,放开价格管制,开放产品市场,使供求直接见面是形成新的价格机制的根本途径,“一放就活”、“一放就灵”、“一放就多”。

后来,在“价格闯关”的口号下,政府事实上采纳了改价格的思路。就在价格闯关的第一年,即 1988 年,我国的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超过 18.6%,个别大城市如北京的物价指数超过 25%,实际上出现了通货膨胀,由此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这次价格闯关的失败,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它证明简单地放开价格的计划控制,并不等于形成了可以产生均衡价格的市场机制;缺乏市场机制运转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放开价格只能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市场波动,遑论均衡价格!

其实,同样的教训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前南斯拉夫及其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就已经发生过。^①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典型的政府强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

① 万解秋等:《价格机制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第 309 页。

中,虽然市场在产品和劳务的定价方面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但距离竞争性市场下的定价机制还有较大距离。

例如,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的是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都叫它“面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一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不称赞“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没过几年,“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可是效果欠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价格问题。

因为按规定,“面的”在红灯前停车不能计费。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区的道路状况不好,堵车是经常的事。这样一来,堵车的损失全部由“面的”司机承担。另一方面,“面的”司机一趟车开下来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1993年至1995年的三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的价格未变,司机们的收入无形之中已经降低了将近一半。司机作为一个“理性人”,当然就要选择线路,对那些比较容易堵车的路线“拒载”。那么,为什么出租车的价格不能适当调整呢?这就涉及到了定价权限的问题。这种例子说明在一个由非市场主体(如政府、行会等)行使定价权的经济体制中,无法形成反映供求关系的均衡价格。

可见,用均衡分析方法来解释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现象,效果并不理想。均衡分析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是以市场发育成熟、经济主体的权利得到保障和政府少干预为条件的,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这些条件。即使是“最大化”这个基于人类基本理性的假设,在有些情况下也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就曾有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咄咄怪事!而这种荒谬的、反理性的思维方式,现在未必已经绝迹了!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好多也是偏离效益最大化目标的。这些就是新古典学派尤其无法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均衡分析无法解释不完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现象,这是重视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受到普遍重视的重要原因。

三、战后不同发展模式所展示的不同效果是 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个非殖民化浪潮。在非殖民化时期,对计划经济的崇拜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一大批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争取到民族独立后,开始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当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局面。不仅技术落后、缺少工业部门,基础设施也很差;而且由于国民收入水平低下,储蓄不足,导致资本严重短缺。面临这种局面,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接受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思路。即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把极为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思路从当时西方经济学的流行观点中获得了理论支持。

当时,“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在许多人看来,凯恩斯主义奉行的通过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主张,似乎同计划经济的精神底蕴是相通的。同时,在那个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新古典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这几股力量似乎殊途同归,使“计划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基础。

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那些崇尚计划经济模式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强调通过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民族经济这个基本的治国理念上,则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奉行漠视制度创新、强调资金和技术投入的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的全部原因归结为要素投入量的大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发现世界突然呈现出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采用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些拼命争取外援,或者信奉“集中力量